

辞书研究

CISHU YANJIU

1
1979

辞书研究

刊名题字：郭绍虞

封面设计：钱震之

辞书研究（第一辑）

编辑者：辞书研究编辑部

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印刷者：上海市印刷四厂

发行者：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出版年月：1979年4月

本刊书号 17187·26

每册定价 0.74 元

辞书研究

1979年 第一辑

发刊词 (1)

实践是检验辞书编纂工作的唯一标准 罗竹风 (3)

解放思想 编好辞书(笔谈)

辞书建设是当务之急 蔡尚思 (15)

突破框框 加快步伐 谭其骧 (17)

按照辞书的规律办事 李俊民 (20)

辞书如何延年益寿 徐铸成 (24)

坚持“六性” 保证质量 李春芬 (26)

大胆吸收 为我所用 伍丹戈 (27)

词典学试论 杨祖希 (30)

谈谈语文词典的阶级性问题 闵家骥 (48)

词的同一性和词目的分立问题 张拱贵 (60)

校读杂记 郭良夫 (75)

编纂《中国大字典》计划纲要 刘 复遗作 (83)

关于《汉语大字典》的编写工作 赵振铎 (97)

关于编纂汉语外来词词典的一些问题 刘正琰 (104)

《中国神话辞典》题记 袁 珂 (118)

编写《世界地名词典》的一些体会.....	刘 伉(127)
试评《新英汉词典》.....	吴 莹(134)
增订《英语惯用法词典》的初步设想.....	葛传槩(139)
法汉词典选词、释义、词例问题初探.....	黄建华(143)
发展我国百科全书事业的一条途径.....	王福曾(155)
百科全书[上](英国百科全书条目选译).....	周忠杰译(160)
《英国百科全书》第十五版简介.....	唐尚斌(188)

批判《哲学小辞典》

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例证.....	周 抗(204)
影射史学的大杂烩.....	严北溟(209)
中国辞书史话[上].....	方厚枢(217)
《说文解字》概述.....	钱剑夫(229)
文献检索与语文研究.....	潘树广(248)
美国大学版英语词典简论.....	李荫华(260)
字迷先生传.....	裘克安编译(272)
日本的辞书(资料).....	(284)

简讯

《现代汉语词典》正式出版 《现代汉语小词典》在定稿中	(82)
《辞海》编辑委员会恢复工作 力争今年出版合订本	(202)
《辞源》修订工作加紧进行 第一、第二分册今年内出版.....	(154)
《汉语大字典》召开第四次编写工作会议.....	(103)
《汉语大词典》转入释文编写阶段	(159)

发 刊 词

《辞书研究》丛刊创刊了。

为什么要创办这样一个刊物呢？客观需要。

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关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从1979年起把全党全国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落后面貌的伟大革命，是一个崭新的课题，需要重新学习，重新创造。在这个重新学习、重新创造的运动中，各行各业，男女老少，都向辞书编纂出版工作者提出了迫切的要求，要辞书，要工具书。

关于辞书的编纂，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遗产。但是，我们目前的辞书编纂出版工作极为落后，与全国人民的迫切需要极不适应，与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地位极不相称。

为了适应新形势和广大读者的要求，目前我国各种类型的辞书（语文的，百科的，专科的，大型、中型和小型的）正在分头加紧编纂。因此，广大的辞书编纂工作者，迫切要求有这样一个学术性刊物，对辞书编纂工作的理论与实践，进行科学研究，包括问题讨论，经验交流，资料介绍，动态报道等等。以上这些，也就是《辞书研究》丛刊的任务。

辞书学作为一门科学，在我国还在孕育之中。编辑出版《辞书研究》这样的专业刊物，我们毫无经验。但是，一个刊物既然创办起来，就一定要把它办好。办好这个刊物，光靠编辑部很少几个

人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依靠集体的经验、集体的智慧和集体的力量，依靠全国辞书编纂出版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依靠广大的作者和读者的热情支持。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我们坚决遵循的一条根本原则。解放以来，我们在辞书编纂工作中有过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我们摸索到辞书编纂工作的一些基本规律，我们要实事求是地加以总结，并使之上升为理论，作为今后工作的参考。林彪、“四人帮”的流毒，一定要坚决肃清。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对的，就要肯定、坚持和发展；错的，就要否定、抛弃和纠正。在辞书编纂和辞书研究中，我们一定要提倡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

“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是我们坚决贯彻的根本方针。在辞书编纂和辞书研究中，我们热烈欢迎学术上各抒己见，相互切磋商讨。只有经过充分的自由讨论，才能使认识不断深化，真理更加明白。

《辞书研究》是广大辞书编纂出版工作者自己的刊物。我们热切地期望大家关心它，爱护它，为它撰写文章，向它提出批评和建议。让我们群策群力，使这块新开辟的园地鲜花盛开。

实践是检验辞书编纂工作的唯一标准

——《辞海》修订工作二十年

罗竹风

(一)

地上本无路，人走得多了，就变成了路。既然开辟成路，走的人自然就会越来越多。

知识是无穷的，门类繁多，并且日益增加。现在物理学已经发展到十几个分支，自然科学中的边缘学科不断出现，说明随着人类的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越来越多的“自然王国”正在被突破，前人认为很神秘的东西，现在已经变成常识了。“未来学”这门崭新的学科，是在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发展起来的，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启发，加以利用和改造，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预言科学，即使在二十年以前，这难道是能够设想的么？

不管是哪一门的专家，也只能精通自己所长期钻研的那一行业务，不可能样样都懂，更谈不上样样精通了。即使个人的专业，也不一定能够攀登最高峰。所谓“隔行如隔山”，倒是老实人说的老实话。但

人们的活动总是多方面的，谁也不甘心做“向隅而泣”的可怜虫，因而工人也并不限于只了解机器，农民除种田之外，还需要看到更广阔的天地。学理工的，需要看些文艺作品，欣赏美术、戏剧，以及其他文化享受。一方面的专家，对其他就未必懂得很多，“互为外行”也是经验之谈，未可厚非的。

为了补救这种“互为外行”的天然缺陷，必须依靠知识的总汇。工具书于是应运而生了。在封建社会，中国的读书人主要是多识多记一些方块字，从形、音、义三方面翻花样，作诗写文章，争取榜上题名，爬上统治者的“宝座”。爬不上去的当然更多，有些当了三家村的冬烘先生，有的懂点琴、棋、书、画，成了“帮闲”，还有极少数铤而走险，参加了黄巢、李自成等农民起义的队伍。但是他们都必须具备知识分子的条件，即所谓读书明理。中国过去“字书”之多，是值得惊异的；但它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汉初学者编辑成书的《尔雅》，是以解释词义为主的，后来有许多“尔雅”学者推而广之，成为类书的雏形。东汉许慎著的《说文》，收字九千三百五十三，重文一千一百六十三，归隶五百四十个部首。它是我国依据“六书”原则解说文字的第一部有系统的字书。清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简称《说文注》）是研究《说文》的重要著作；此外，如桂馥著的五十卷《说文解字义证》，王筠三十卷的《说文句读》，朱骏声十八卷本的《说文通训定声》，都是研究《说文》的重要著作。近人丁福保的《说文解字诂林》（先后共计八十二册），集以往“说文”学之大成，可以说是有关《说文》著述、注释的总汇了。《康熙字典》共收四万七千零三十五字，流行很广，几乎成了读书人经常查字的工具书。后来中国文字学专家章太炎、黄季刚、钱玄同等，都是属于从《说文》研究文字这一系统的。

文字是打开知识之门的钥匙，连字都不识几个，怎么能谈得上什么学问呢？但识字不过是第一步，要想开扩眼界，探索人类知识的宝库，还有待于其他工具书的帮助。过去的《辞源》、《辞通》还没有涉猎更多的范围，旧《辞海》倒是向“百科”前进了一步的综合性工具书，但语词部分仍然占全部条目约三分之一。至于《大百科

全书》，欧美各国和日本以至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都已陆续出版，中国却还是一大缺口，仅仅在去年才开始正式筹划。

随着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开展，人类越来越需要更广泛的知识，要求用各种知识武装头脑，以利于向自然和社会的广度、深度进军，因而编写出版综合性的、专科性的工具书，从各方面满足广大群众的求知欲，就成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了。就某种特殊意义来说，“知识就是力量”这个口号，还是正确的。我国正在把工作重点转到四个现代化方面来，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四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任务是十分光荣而又艰巨的，必须全力以赴，才能达到目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工具书的出版工作，还是与当前的工作任务非常不相适应的，落后了几乎一两个世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号召，要求“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一九七九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转移，各条战线都必须环绕这个中心，相应地改变一切落后于形势的东西，努力赶上去。可以设想，各种工具书（大、中、小型的，综合的、专业的以至于大百科）必将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光荣任务。因而《辞海》的最后定稿，作为向建国三十周年献礼的一项礼品，在其中是占有一定地位的。

（二）

旧《辞海》刊行于1936年，是以字带词的综合性工具书，相当于字典兼小百科性质的中型辞书，供中等文化水平以上的读者查考之用。几十年来，它在中国相当流行，起过一定的作用。时隔几十年，无论是国际、国内，形势都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

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已经也有了很大发展。解放以来，旧的《辞海》已经不能适应新的要求了，必须重起炉灶，或者在原有的基础上加以修订，才能有用。其中，百科条目尤为显著。希特勒、墨索里尼都是屠杀人民、摧残人类文化的混世魔王，难道还能原封不动地加以赞扬么？少数条目的内容很反动，很多条目的面貌陈旧落后，必须彻底改变这种状况，才能使旧《辞海》获得新生，而对读者有益无害。

1957年9月间，毛主席来上海，对原《辞海》主编舒新城先生谈起重新修订问题，并把这项任务交给了上海。1958年春开始筹备，搭架子。当时正号召大跃进，各条战线都在轰轰烈烈地大搞群众运动，炼钢如此，种田如此，演戏、写诗、出书莫不如此。什么事情离开“大”字当头，就算是右倾、没有干劲，甚至于“甘居下游”。人们的精神状态是好的，但滋长了浮夸风则是其中的消极因素。《辞海》修订工作，一开始就卷进了“大”字号的漩涡里去，头脑发胀，大忽隆了一阵，当然要强化所谓走群众路线。结果是所写的释文，几乎全部不能用。从教训中摸索前进，1958年夏季在锦江饭店南楼第一次集中时，除选定词目以外，许多学科都写出“试稿样”，作为今后“依样画葫芦”的标兵。苏步青教授在数学“直线”这一条中，反复思索，煞费苦心，写出的释文突破了旧框框，树立了一个榜样。当时为了有所遵循，曾经提出过“政治性、科学性、通俗性”，即所谓“前三性”，作为修订《辞海》的参考。从此以后，大家心中有点数了，工作的开展也比较顺利。但是到《辞海》十六分册（内部征求意见稿）出版时，脱离“四至”（条目内容的限制）、以大批判口气写释文的现象还相当严重。好象只有大批判，才能表现无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不这样能行么？实际上，这是对工具书没有摸透规律的结果，仍然带有极大的盲目性。

在浦江饭店二次集中修订时，为克服这种缺点和错误，又提出了“正面性、知识性、稳定性”，即所谓“后三性”。对1965年出版《辞海（未定稿）》起了良好的作用，从而更加明确了工具书的性质和任务。应当说，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知识性就是辞书的灵魂。没有知识，只说空话，又能有什么用处呢？至于稳定性，乃是知识性的支柱，离开了它，知识性就会晃悠悠，今天也许有用，但时过境迁，便失掉意义，没有多大价值了。报纸、刊物、书籍各有不同的职责，担负着从各种角度来满足读者多样化要求的分工。工具书不妨比作“重武器”或“基本建设”，编写过程长，印制过程也长，天然没有反映“瞬息万变”众多事物的任务。所收词目，必须是成词而又为群众所公认的；所写释文，应当客观、翔实，在相当时间内是不受政治运动影响，而随之偏斜的。两个“三性”互相作用，有其内在的必然联系，具体贯彻到一个条目中，就正是工具书所要求的，也是它应有的一种特色。即使这样的简单道理，还是走过一段弯路才摸索出来的。实践出真知，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对于《辞海》修订工作也并不例外。

什么组织形式比较适合于领导《辞海》的修订工作呢？在当时的条件下，由出版局、出版社直接领导，恐怕都不恰当。《辞海》虽然不是大百科全书，但它所涉及的知识面相当广泛，必须依靠上海以至全国学术界的集体力量，才能挑起这副重担。因此，由各有关方面（大学、科研所、业务部门等）的代表性人物组成编委会，然后确定各学科的主编负责职，是行之有效的办法。否则力量分散，便无从调动学术界的积极性，也不能按照预定计划进行工作。一般应以分散写作为主，这样便于扩大工作面，吸收更多的专家学者参加；但一定时间的集中，也是不能缺少的。因为《辞海》是一部完整的书，在各学科分写的基础上，还必须按照以

字带词(词又按笔划、字数多少)的体例,打乱合编,而各有关学科之间的交叉词目又相当多,要处理得完满而无遗漏,就得集中解决。分散为主,加以适当集中,恐怕也算是一种有益的经验吧?同时作者(编写人)与编辑之间,也要多协商,多研究,红花绿叶相得益彰。涉及内容问题,编辑不宜轻易改动;但一般技术性问题,作者也不必限制过死过多,就让编辑放手处理好了。经验证明,在长期修订《辞海》的过程中,作者和编辑的关系还是相当融洽的。

原来设想:在十六分册的基础上出“未定稿”,再广泛征求意见,进行一番修改之后,《辞海》就可以公开发行,与广大读者见面了。但文化大革命一来,不久全部工作即陷于停顿,而且被作为天字第一号的“大毒草”进行批判,当时中央文革宣传出版组的所谓《关于〈辞海〉批判问题的指示》(1967年7月7日)中,就定下了调子。原文如下:“一、《辞海》未定稿大有批判的必要,其指导思想值得批判。旧中宣部给书记处的报告很明显的反映了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就以这个‘报告’而言,已大大可以批判了。他们借口‘不好写’、‘不易写好’为幌子,大反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如对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林彪××就讲得很明确。”中间说了一些废话,例如什么“在批判中考虑如何编好一部反映毛泽东思想的新辞书”啦,什么“你们在搞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时随帮助”啦,等等。但最重要的却是“……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可以解决得更及时”。

接下来紧锣密鼓,批判《辞海(未定稿)》的所谓群众运动喧嚣一时,“上海批判《辞海》联络站”成立时还发表了《宣言》,说什么“由全市七十多个单位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组成的上海批判《辞海》联络站,将和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干部和红

卫兵小将一起，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批判大军，运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打一场惊心动魄的人民战争，以‘只争朝夕’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集中火力，发动猛攻，穷追猛打，直捣老巢，把《辞海》这株大毒草连同炮制这株大毒草的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以及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统统批倒批臭。”而且还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组织上彻底揭露和清算刘、邓及其在旧中宣部、旧文化部、旧上海市委内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反动学术‘权威’在《辞海》犯下的滔天罪行，斩断刘、邓伸向《辞海》的黑手；彻底批深、批透、批臭大毒草《辞海》，肃清它在全国的流毒。”

从封面题字一直到内容，都被批得体无完肤。凡是参加编写的人，几乎无一幸免，全挨了棍子，戴上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或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百分之九十六被打成了牛鬼蛇神。《辞海(未定稿)》也就变成集古今中外封、资、修之大成的大毒草了，而且“字字都是黑的”，似乎万劫不复，永世不得翻身了！

在“四人帮”的淫威之下，《辞海》修订工作被迫停顿了好几年。1972年周总理把这项工作又列入出版规划之内，并且提出“小修小改，快速出书”的方针，这就充分证明了“四人帮”及其爪牙强加给《辞海(未定稿)》的所有诬蔑不实之词，都应当推倒。可是“四人帮”利用他们所篡夺的一部分权力，妄图把《辞海》变成他们树碑立传的工具，于是利用批林批孔、评法批儒以及评论《水浒传》种种时机，拚命塞进一些见不得人的黑货，吹捧吕后和武则天，为叛徒江青“登极”(当女皇)鸣锣开道。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这群丑类的阴谋诡计才未能得逞。将近两年的继续修订工作，使《辞海》得以新生。当然，“四人帮”的流毒一时是不可能完全肃清的，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努力。

回顾往事，可以充分地看出来，环绕着《辞海》修订工作，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极为尖锐复杂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它走了一个“之”字形的曲折道路，从而经验教训也是相当丰富的。从一部书看十多年来的风云变幻，只能使我们增加勇气，为夺取最后胜利而努力奋斗。

(三)

“嗷嗷待哺”这句成语，形容饥饿待食的人是很形象化的。如果借以形容求知欲旺盛而缺少精神食粮的情况，也是非常恰当的。多年来，从高级知识分子、干部、工农兵以至小学生，都用一本《新华字典》。难道文教界的饥荒还不够严重么？即使这本收字约八千五百、语词约三千二百的小字典，也还是由周总理的关怀、督促而出版的。不然，在“四人帮”的严密控制之下，情况还要更坏一些，工具书可能是个大○蛋呢。

二十多年来，《辞海》的修订任务未能及时完成，我们有亏于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有亏于广大的知识分子和干部，也有亏“望眼欲穿”的所有读者们。1978年冬，中央和上海市委重新提出修订《辞海》的任务，而且及时地恢复和加强了编委会，决定集中各学科的专家学者作最后一次的修订工作。这次修订，以“未定稿”为基础，吸取“修订稿”的积极成果，彻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而且要“去毒务尽”。于是人心振奋，斗志昂扬。许多老教授、老学者，虽年老多病，但仍然积极参加工作，贡献自己的所有智慧和能力，为认真提高《辞海》质量而战斗在第一线上。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奋斗，胜利在望了，争取向建国三十周年献礼，绝不至变成一句空话。

通过这一阶段的最后修订工作，所取得的成绩是什么？基本

经验又是什么呢？概括起来，大约不外乎以下几条：

一、辞书就是辞书，不同于一般书籍和论文。这正象苹果就是苹果而不是生梨一样。但是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过去却走过不少弯路。辞书的特点是应该结合过去所提出的“前三性”和“后三性”融会贯通，加以深刻体会。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其他的方针么？我认为概括起来，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例如对历史人物，不能一棍子打死，而要就当时他所处的时代和环境，进行具体分析，是就是，非就非。假如习仲勋同志一直不露面，彭德怀同志尚未平反昭雪，对于解放战争的第一野战军，究竟应当怎样写法呢？没有司令员和政治委员，这对一支强大的野战军，岂不是莫大的讥讽？对李秀成这样一位在太平天国起过很大作用的人，难道能够象威本禹那样以“叛徒”定罪，而全盘否定？海瑞能因姚文痞的一篇所谓“评论”，就打入十八层地狱么？好就好到天上去，坏就坏到脚底流脓，这绝对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辞书不是一家之言，不是一般的评论文章，更应当多想想，前后左右都想到，万不可草率从事。有实事求是的精神，自然就会做到客观、稳妥，给予读者以比较完整而又准确的知识。不然，就是没有尽到本分。如果传播了错误或者片面的知识，对读者的害处将是不可估量的。老师教小学生识错一个字，以后便很难改正。人们总是把辞书作为典范的，因此，就更加马虎不得。

二、辞书不是从头到尾读的，而是备查考用的工具书。人们通过工作、学习，不断地积累知识和经验，然后再推动工作、学习提高和发展。如此往返，就使知识和经验的积累更加丰富。但在工作和学习中，必然会遇到许多疑难问题，请教别人当然是办法之一，别人如果不能解答，又将如何呢？那就到辞书里去寻求

答案嘛。因此，辞书也是为“质疑问难”，为解决人们工作、学习中的“拦路虎”起一定的辅助作用的。如果不解决这些“拦路虎”，无论工作或学习，即将受到干扰，而不能畅通无阻。

根据这一准则，辞书内容要简要、明确。把主要脉络交待清楚，不带任何水分，只让事实出来讲话，是什么就是什么。不夸大，也不缩小。更不能随便带帽子，夹杂一些多余的、外加的和不必要的大批判口气。《辞海》体例规定，大条目不过四五百字，中条目三百字左右，小条目只有一二百字。因此，除最基本、最重要的知识以外，不能再增加什么额外负担了。“言简意赅”，要言不烦，大约就可以概括了。

原来所定的“四至”，正象旧社会的田契一样，把土地的面积勾划清楚。例如：东至庙，西至桥，南至沟，北至道。一个条目的“四至”，不能超出其内容范围，任意发挥以至越界。譬如写“孔子”一条，资料很多，但怎样进行选择，去粗存精，把最主要的东西加以吸收、采纳，给读者以最基本的知识，这是应当深思熟虑的。否则头发胡子一把抓，必然会导致混淆不清的后果。若在一般文章，还可以设法补救，辞书恐怕就难以挽回了。尽量做到字斟句酌，实在是非常必要的。

三、应当依靠知识分子，特别是依靠专家学者编写辞书。编写辞书要走群众路线，也是理所当然的。所谓群众路线，主要的是调动广大知识分子(专家学者在内)的积极性，业务对口，充分发挥其所长。一开始走的群众路线，是大炼钢铁的那一套，写出来的稿子全部作废。针对这种情况，当时提出了“宝塔形”的写稿原则，越到后来人数越少，几乎完全是某一学科的专家了。至于“四人帮”专横时期所提出的“三结合”写作方法，什么党委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把写作过程零切碎割，那简直

等于胡闹了。

修订《辞海》，属于提高工作，需要专长。不懂得历史地理，能够分辨边界的定位么？把中国的地方划出去，固然不对；但把外国的随便划进来，也同样要犯错误。拿自然科学来说，数、理、化、天、地、生，哪一样不需要较广泛而又精到的知识，把它凝聚在短短的几百字的释文里，以满足读者质疑问难的需要，就象浓缩铀一般。这是由提高走向普及的过程，但把每条的释文恰如其分地写出来，本身则是一种提高工作。离开专家学者，是无法完成这一艰巨任务的。

社会分工不同，一切工作都无尊卑高下之分。应当尊重任何人的劳动，如果没有清洁工人，城市将会变成什么样子！辞书的编写工作主要应由专家学者承担，这是他们对人民对国家应尽的义务，决不因此而高人一等。明乎此，一切不必要的争论就可以平息了。知识分子不以自己所掌握的知识为人民服务，又能拿出什么更好的东西来为人民服务呢？况且知识分子、专家学者也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其特点应当更加充分地发扬起来。

这次修订《辞海》，最主要的是把“四人帮”所散布的流毒比较彻底地清除了，把水分杂质挤得干净了一些，大批判的语气去掉了，帽子之类的东西不大有了。比较能够实事求是地评价人物，对若干重大理论问题，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做了应有的修改。同时，也更新了许多条目，填补了十多年来的某些“空白”，时代气息、学术水平都有所增加和提高。

由于时间紧迫，水平有限，加以某些事物的矛盾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而各学科又参差不齐，缺点和错误总是难免的。这有待于广大读者及时批评与指正。

从《辞海》修订以来，二十多个年头过去了。有些学科还没有